

您的位置：比较政治研究网>学科发展

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研究

作者：

熊易寒

来源：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第235期

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研究

熊易寒 李辉 唐世平

来源：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第235期，2011年11月3日

好的比较政治研究不一定需要依赖一手资料。大家所熟悉的摩尔的《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》几乎全部是基于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而成。现阶段，中国学者要通过跨国抽样调查，甚至通过对其他国家的一定时间的实地调研（半年以上）来采集数据恐怕还很困难。相比之下，利用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和现成的数据库资源是较为理想的选择。基于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，需要更多的思想创新。也就是说，必须问出新的问题，提供新的思路，创造新的变量乃至数据库。目前，大部分所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都仅仅是把一些二手资料顺手拈来，点缀一下，基本没有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有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。

要想做到以上提出的要求，有两项基本功必须要扎实：一是对文献的关注，尤其是英文文献；二是要尽快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。

关注文献引用增强方法论培训

在国内发表的大量比较政治学的论文中，缺少文献回顾部分。即便有一些作了文献回顾，所回顾的文献要么完全忽视西方的研究，要么所引用的英文文献有很强的随机性，并没有完全掌握其所涉猎的研究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理论和范式。还有一些虽然是专门的文献综述文章，但是他们所涉及的文献依然以中文翻译资料居多，大量相关度非常高且无法被忽视的文献，却都没有被引用。

在介绍和引进（比较）政治学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误区。虽然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比较政治

学的经典著作，但缺乏系统化的引介。杰拉多·蒙克认为，比较政治学一共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，分别是比较政府或宪法阶段（1880—1920）、行为主义阶段（1921—1966）、后行为主义阶段（1967—1988）、第二次科学革命阶段（1989年迄今）。而我们引介的滞后性却十分明显。一些比较政治学的教材仍在主推阿尔蒙德、亨廷顿、李普塞特、摩尔等第二代比较政治学家以及少数第三代佼佼者（如帕特南、蒂利、李普哈特、斯考契波、普沃斯基）的学术观点，而第三代和几乎整个第四代的比较政治学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

首先，国内学界有重专著、轻论文的倾向。经典和新的重要著作当然依旧值得关注，但对于研究而言，《世界政治》（World Politics）、《比较政治》（Comparative Politics）和《比较政治研究》（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）等一流比较政治专业学术期刊上的最新论文应该更为关键。因为这些成果往往是国外最前沿的，也代表着其学术发展的趋势。

其次，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方面有重欧美而轻其他之嫌。对拉美、非洲、东南亚、东欧等地区的关注度明显偏低，而事实上对于第三世界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热点和亮点。而在中文比较政治文献中，基本上看不到对这些文献的引用。

最后，必须尽快补上方法论的训练。大多数高校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，在方法与方法论上的培训都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。其中最大的缺口是定量的研究方法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，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生都要求掌握统计等基本的定量研究方法，且从本科阶段开始就有系统的培训课程，但是政治学却没有。我们的政治科学训练必须包括至少两到三门的方法论课程，而且还必须不断跟踪方法论的进展，比如，最近有很多发展的反事实分析、QCA等方法

改进科研制度修正期刊评价体系

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进步不仅需要宏大的学术视野、科学的研究方法，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。通常而言，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科研周期相对较长，需要投入相对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资源，常常需要团队合作。因此，除了学者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的方面之外，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制度激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认为两个方面的制度改进最为重要。

其一，修正研究基金发放的取向，鼓励真正的学术合作研究。各项研究基金的发放是引导学者研究取向的重要制度之一。就国内目前的状况而言，研究基金对于鼓励学者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来说意味着两层

含义。一方面，目前国内学术界习惯单兵作战。如果要真正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，必须提倡团队研究与合作研究。而国内目前的学术体制基本不鼓励学者，特别是青年学者之间的合作，因为只承认第一作者。另一方面，比较政治研究因为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比较，难度比起纯粹研究中国国内问题要更大。这就意味着，对比较政治的研究经费支持必须周期相对长一些（比如5年为一期），资金量也要比纯粹的研究中国国内问题的经费更多一些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各类社科基金撒胡椒面式地划拨经费，周期也很短。这基本上意味着大规模的比较研究难以为继。

其二，修正期刊论文发表的取向，乃至整个评价体系。前面已经提到，国内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多为口号式文章和介绍性文章，但是真正扎实规范的实证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非常少。这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易写易发，后者则难写也难发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高端的学术杂志必须鼓励真正的实证比较政治学文章，稍有档次的学术杂志应该从此不再刊发“口号型”、“标签型/判定型”、“伪装是知识”型的文章，以及肤浅的评价和介绍文章。这些文章只能占用学术资源，阻碍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的成长。相应地，就评价体系来说，我们的评价不能仍是停留在看文章数量上，甚至发表在什么样的杂志上，而是要看文章的具体内容和水平。

中国学者必须问出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切实相关的问题，并且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。而只有有了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，我们才有资格和可能谈论所谓的理论和实证的突破，从而才有可能谈论“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”、“中国的比较政治学”、“中国学派”、“中国经验”等这些大的话题。否则，都只能是空喊口号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）

[阅读全文](#)

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，如果涉及版权问题，请联系我们。

[\[关闭窗口\]](#)